

沙家浜

坚实的芦荡
摇曳的散文

□ 隋明梅

踏访



唐市即现在的沙家浜镇群众,为让部队快速行军,还用各家的小船为部队搭建“船桥”。妇女们则做军鞋、缝军衣,用湖里的鱼虾补养伤病员。郭建光唱的“一日三餐有鱼虾”并非编剧瞎编。

所以,阿庆嫂、沙奶奶并无其人又确有其人,她们是全体阳澄湖地区人民的化身。正如阿庆嫂唱的,“我们这个镇子里家家住过新四军”,满镇尽见阿庆嫂、沙奶奶。不过,胡林芳听老人们说,新四军有纪律,不能住老乡家,通常只住自己扎的草棚子。鬼子的巡逻船靠近了,乡亲们会用自家的船把伤病员送下湖。人与船、军与民顿时消失在迷宫一样的芦荡里。于是,日本人“把个沙家浜翻个底朝天”,也见不到一个新四军伤病员。

因为是晚春初夏,我没有机会体验狂风暴雨的芦荡。这里的老人们说,戏里的“暴风雨来了”那场景远不能表现真实的芦荡暴风雨之夜的可怕。那是排山倒海的呼啸,地动山摇、水天相撞。但是,即使摇得天晃地动,那生长在荡里、浜里、泾里的芦竹、芦苇、芦荻等,也只是摇摇头和身子而已,他们的根永远在那里——沙家浜的荡浜泾的泥水里。

人们习惯说沙家浜如诗如画,我倒觉得恩格斯在《风景》中的话最合适评价沙家浜:“只有易北河左岸的马铃薯原野,才是代表着德意志的真正的散文。”芦苇荡里的沙家浜,不正是代表着中国水乡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真正的散文吗?

湖里睡着郭建光

老人魂归阳澄湖,守望着“全靠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美好江南鱼米乡”的沙家浜

京剧《沙家浜》是毛泽东主席给起的名字。所以,沙家浜人总是自豪地告诉来访者,他们镇的名字是毛主席起的。1964年春夏,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京剧连演百场。7月23日,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并接见全体演员。老人家用他那浓重的湖南普通话说——夸赞演员演技后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的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给戏曲起名字。1992年,常熟最南边的横泾、唐市正式改名沙家浜镇。

毫不夸张地说,京剧《沙家浜》是那个年代舞台和银幕上最闪亮的戏曲作品。她有革命样板戏的铿锵硬朗宣传特性,又不失戏曲的柔美教化功能,更以浓郁但不失大气的江南人文气息、优美而不舍规范的唱腔、革命化却不排斥戏剧化的韵味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改名后的沙家浜镇可谓逢其时,毫无悬念地成为红色旅游的热土。尽管这里有华东最大的湿地公园,有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第一次来此旅游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奔

的却不是浪漫的绿色和鲜美的大闸蟹,而是这样两件事:阿庆嫂和她的春来茶馆里的机智幽默和果敢,战斗在阳澄湖上的郭建光等18位伤病员的传奇。

更传奇的是郭建光还在芦荡里!

这是一方横约尺半,高不足一尺的小石碑,上书“夏光同志之墓”。夏光是郭建光的3位原型之一,2012年,103岁的老英雄去世。按他的生前愿望,老人魂归阳澄湖,与成行的岸柳一起守望着“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的壮美景致,守望着“全靠劳动人民一双手画出了美好江南鱼米乡”的沙家浜。

守望沙家浜,就是守望爱国与和平,守望信念与信心。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前的一块石刻上有这样一段话:“沙家浜的意义在于,在沪宁铁路武进以东直到上海地区能否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六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东进,建立了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根据地,以及澄锡虞、嘉定、青浦根据地。”这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1990年5月故地重游时留下的话。

这位当年的“江抗”领导人,是从菲律宾吕宋岛走到华东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六团团长。他和战士们深入日本侵略者的重重包围圈里,深入江南的埠港浜村中,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战斗中的伤病员无法转移,于是,就有了沙家浜的传奇故事。随叶飞东进的参谋长夏光也成了伤病员。但伤病员们并不安心养伤,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务连,以千里芦荡为战场,继续与日伪战斗。更传奇的是,这支36人的伤病员队伍,星火燎原,一路发展壮大,后来真的是“驰骋江南把敌杀”。

第19棵青松是芦竹

我找到第19棵青松了,就是这摇曳的芦竹芦苇芦荻,就是这片土地上爱国的人民

追寻着18棵青松“奋臂挥刀斩豺狼”的足迹,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在沙家浜,除了阿庆嫂和18棵青松,还应该找到别的,比如第19棵青松。只是,那“八百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的青松会是什么?

春夏之交访沙家浜是一种幸运,因为看



位于江苏省常熟市东南方、毗邻阳澄湖的沙家浜镇,因京剧《沙家浜》而家喻户晓。

抗日战争时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根据地犹如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弯刀,对能否推进沪宁铁路武进以东直到上海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70年过去了,今天的沙家浜,是著名的

开栏的话

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册上,有许多地名熠熠发光。

这里的人,曾众志成城,用热血换回和平安宁。

这里的地,曾满目疮痍,坚强地固守着中华的魂。

本周起,我们将推出《踏访》系列报道,带领读者踏访这片热土,探寻70年来的沧海桑田,神州巨变,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到的是郭建光70多年前对沙家浜的描述:“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锦绣江南鱼米乡”和“一日三餐有鱼虾”。这幅曾让那个时代的人们憧憬的画卷,更使当时的两代人痛恨入侵者。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如今,沙家浜没了入侵者,当然就没有

有枪炮的轰鸣,而是苇竹丛丛,白鹭悠悠,泾浜静谧,湖水镜明。为了让白鹭等鸟儿的生活回归自然,沙家浜人把芦荡湿地公园做成了真正的鸟的家园。芦竹不再应季砍伐,任由“黄芦苦竹绕宅生”——说来也奇妙,在沙家浜看阳澄湖湿地公园里的芦黄苦竹,竟然与白居易的感受完全不同,觉得一切是那么美、那么善。想来是因为这黄芦苦竹是人类尊重鸟儿的生存愿望使然,是眼前的和平安宁景象使然。

拂这种恬静乘竹筏下阳澄湖,便不像身临汪洋大海而恐人生无助,也不像泛舟长江太湖而感世界浩瀚,只感到做沙家浜人幸福,而做沙家浜的鸟儿更幸福。

当然,这幸福是“挺然屹立傲苍穹”的青松式抗日战士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18棵青松的原型36位伤病员,已有35位离世,目前只有一位健在,因为各种看望采访让老人很累,所以我不忍再多打扰他,也不想公开老人的所在。老人与他的参谋长一样,希望将来长眠于沙家浜,看“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愿“祖国的好山河寸土不让”。

有游客留言说,感谢抗战英雄们保卫了祖国的好山河,才让他们来到并看到了美丽的沙家浜。

可是,到了沙家浜,有人却很难理解一件事:湖里有这么多好吃的,新四军战士为什么还挨饿呢?一个假在小伙怀里的姑娘小声咕嘟着。估计姑娘是北方人,而且没听过《沙家浜》的对白。芦荡里虽有水八仙,水芹、莲藕、荸荠、茭白、茨菰、芡实,还有鱼虾蟹螺蛙等,但很多时候是不能生火做饭的,因为日本鬼子的汽艇常在湖上巡逻。

到了沙家浜,有人还难以理解另一件事情:这里离上海、无锡、苏州那么近,共产党怎么敢把后方医院建在这儿?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什么总找不到新四军伤病员的踪迹?

到了沙家浜,下到阳澄湖,尤其身处迷宫一样的芦荡时,疑问豁然有解:芦荡分明就是铁壁铜墙。芦竹、芦苇、芦荻等阳澄湖植物,他们虽然迎风而摇曳着,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他们的根紧紧地缠结在一起,不分你我老幼,无论芦苇葳蕤,肩并肩手挽手,筑起湖中迷宫,搭起浜里医院,构成水上战壕,既掩护青松们治病疗伤,又在游击战中做助攻。这是一道坚实的芦荡长城!

我找到第19棵青松了,就是这摇曳的芦竹芦苇芦荻们,就是这片土地上爱国的人民。

抗战记忆

寻找方大曾

□ 梁婧

报道“卢沟桥事变”的第一人方大曾,在同年9月离奇失踪。那一年,方大曾只有25岁。有学者说,他是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的第一名战地记者。后来的人们被他充满激情的报道打动,也没有停止寻找他的脚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冯雪松就是其中一员。

199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冯雪松偶然看到一个沉睡在历史资料中的名字——方大曾(笔名小方)。这个陌生的方大曾,是上海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曾发起成立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组建中外新闻学社……无论哪个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名头,《中国摄影史》中关于他的介绍却加起来还不足百字。

冯雪松找到了时年85岁的方大曾胞妹方澄敏。“我至今无法忘记老人无助的表情和脸颊上的泪水。哥哥留下的837张底片,被她整齐地摆放在木盒里。”阳光下,一张张黑白底片向冯雪松展开了抗战初期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打响全民抗战第一枪的震撼场面!冯雪松说,他不敢相信,这些珍贵的照片是出自一个25岁的青年人 hands。从那时起,就有一种力量牵引着他用心去“寻找”方大曾。

15年的时间,冯雪松用汗水和脚步逐渐勾勒出方大曾的轮廓:

方大曾出生于外交官之家,少年时酷爱摄影。他的镜头很少对准亲朋好友,而是聚焦船夫、纤夫、矿工等劳苦大众。他将那些被忽视的形象定格在镜头里,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温80年前真实的中国。

“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方大曾如是写到,笔名“小方”因此而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方大曾正在家里休假。得知日军进攻的消息后,他第一时间从北平市区前往卢沟桥、长辛店采访、拍照。靠着满腔热情,方大曾很快写出了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达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有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通之客极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我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远远地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这也成为我国新闻界对“卢沟桥事变”的第一篇报道。

“日军两架飞机从长辛店上空投掷炸弹。当时,方大曾正在那里采访。”同行的《实报》记者宋致泉回忆:“炮声震耳欲聋……小方跑在最前边拍摄平汉路上的将士。”冒着枪林弹雨,方大曾记录下了士兵们如何拔出大刀斩去了敌人半个头,如何在打败敌人后拼命追杀,集合号也不能把他们叫回来……”

此后,他又转战长辛店、良乡、保定,用照片和报道把读者带到了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

然而,1937年9月30日,发自河北蠡县的报道《平汉北段的变化》刊登后,方大曾就消失了。

冯雪松说,15年间他不停地寻找方大曾,不单单是为了找到这个人,更重要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方大曾。“我希望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的、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这个年轻的生命用镜头描述了当年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在当时,他的报道鼓舞了中国人抗日的士气和斗志;在当下,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他为后人留下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本。”

冯雪松觉得,方大曾是年轻人的楷模:“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他选择了与国家同甘苦共患难,用自己的作品记录了危亡时刻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激情实践着个人对民族精神的传承。”

这样的“找寻”,冯雪松愿意继续下去。